

先秦道家

『名』思想研究

Xian Qin Dao Jia
Ming Si Xiang
Yan Jiu 周晓东◎著



先秦道家

『名』思想研究

Xian Qin Dao Jia
Ming Si Xiang
Yan Jiu

周晓东◎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先秦道家“名”思想研究 / 周晓东著. —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068-6128-1

I. ①先… II. ①周… III. ①道家思想—研究—先秦时代 IV. ①B223.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73129 号

先秦道家“名”思想研究

周晓东 著

责任编辑 刘 娜

责任印刷 孙马飞 马 芝

封面设计 田新培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53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媛明印刷厂

开 本 170 毫米 × 240 毫米 1/16

字 数 155 千字

印 张 12.5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6128-1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引 言	1
第一节 研究对象、研究历史与现状 2	
第二节 “名”思想研究的方法 22	
第一章 道家“名”思想的学术背景	29
第一节 成命百物的传统 31	
第二节 语言与孔子的正名 35	
第三节 “名”思想的语言转向 41	
第二章 老子的“名”思想	53
第一节 “名”的内涵 54	
第二节 名与德 61	
第三节 名与道 65	
第三章 庄子的“名”思想	73
第一节 庄子“名”思想对儒家的回应 77	



第二节 庄子与名辩 99	
第三节 道通为一与道术为天下裂 114	
第四章 《黄帝四经》与《管子》四篇的“名”思想	121
第一节 《黄帝四经》的“名”思想 122	
第二节 《管子》四篇的“名”思想 128	
第五章 《鹖冠子》的“名”思想	139
第一节 道的形而下转化与道名法系统 142	
第二节 天人感应与“名”“分”的思想 156	
第三节 “分”与“正” 165	
第四节 余 论 173	
结 语	179
参考文献	185



引言





第一节 研究对象、研究历史与现状

“名”是先秦思想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是先秦诸子讨论的中心内容之一，在先秦政治、逻辑、语言哲学等方面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陈启云先生论述先秦诸子哲学思想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时说：“这个阶段中更重要的发展是从这种辩难而引起思想家们对思想的本质、知识的来源和根据、真理（是非、胜负）的标准，以及思想、知识、真理和语言的关系等种种问题的反思；因此发展出在思维方法、逻辑和语言哲学上可以和西方哲学相比类，甚至比西方哲学更为早熟的哲学理论。”^①这一阶段思想的发展，主要是围绕着“名”进行的讨论。同时，“名”在先秦诸子的讨论中呈现较为复杂的局面，与“名”相关的概念有“名实”“名形”“名刑”“名法”“名理”“名言”“名辩”“名分”“名守”“名刑”“正名”等，因此，首先需要对“名”的基本含义及用法进行分析。

《说文解字》曰：“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②可见，“名”的基本含义是称呼自己。在古汉语中，

① 陈启云：《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历史论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7页。

②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名”的用法主要有如下几种^①。

1. 自呼名

《礼记·曲礼》：“父前子名，君前臣名。”

2. 呼人之名

《礼记·曲礼》：“国君不名卿老世妇。”

3. 名誉

《周易·乾卦》：“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4. 大

《尚书·武成》：“告于皇天后土，所过名山大川。”疏：“山川大，乃有名，名大互言之耳。”

5. 名号

《仪礼·士昏礼》：“请问名。”疏：“问名，问姓氏也。名有二种，一是名字之名，一是名号之名。孔安国注《尚书》，以舜为名。郑君《目录》，以曾子为姓名，亦据子为名，皆是名号为名者也。今以姓氏为名，亦名号之类。”

6. 号令

《国语·周语》：“言以信名。”注：“信，审也。名，号令也。”

7. 文字

《仪礼·聘礼》：“不及百名书于方。”注：“名书，文也，今谓之字。”疏：“名者，即今之文字也。”

^① 此处列举的用法及例子，引自《康熙字典》。



8. 功

《国语·周语》：“勤百姓以为己名。”注：“功也。”

9. 明

《释名》：“名，明也，明实事使分明也。”

10. 眉眼之间

《尔雅·释训》：“目上为名。”注：“眉眼之间。”

11. 命

《史记·天官书》：“免七命。”注：“免星有七名。”

其中与先秦思想史上“名”范畴相关的，主要有名誉、名号、号令、明等义，这些含义都是从“自命”这一基本义引发出来的，对先秦“名”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些方面。

“名”的思想起源很早，上可追溯至先民自身与自然剥离，初生自我意识之时。汉代思想家董仲舒指出：“名者，大理之首章也，录其首章之意以窥其中之事，则是非可知，逆顺自著，其几通于天地矣。是非之正，取之逆顺；逆顺之正，取之名号；名号之正，取之天地。天地为名号之大义也。”^①认为“名”起源于天地自然秩序，乃大理之首章也。商周时期，“名”与“礼”构成了社会运作的基石。李泽厚认为：“‘礼制’中的‘名’不只是事物的名称，它是天地的法规、神圣的符号，也是人的生存、活动、地位、利益的代表。”^②“名”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春秋以降，社会剧变，在新的社会环境下，旧有的“名”思想受到猛烈冲击，引发了先秦诸子对“名”思想的重新认识和激烈讨论。先秦诸子对“名”思想的讨论是全方位的。他们从“名”的本质、社会政治

① 董仲舒：《春秋繁露》（四部精要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809页。

② 李泽厚：《新版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4页。

作用、语言形式、逻辑学等多方面进行了讨论。

考察先秦“名”思想，首先需要对几个基本概念加以说明。

1. “名”思想与名学

名学作为一个学术用语，最初被作为英语“logic”一词的汉语意译，表示逻辑学。严复翻译英国逻辑学家弥尔的《逻辑学体系——归纳与演绎》，所用汉译名为《穆勒名学》。除此之外，名学还被用来指称“中国古代逻辑”，如胡适的《中国名学史》。崔清田则指出：“狭义的名学指先秦名家的学术思想。广义的名学不仅包括名家之学，也包括先秦各家有关名的讨论。”^①

名学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含义，使用上又有广狭之分，很容易引起混乱。另外，以上几种用法，无论哪种含义，都无法涵盖“名”这一思想范畴的丰富内涵。因此，笔者使用“名”思想的提法，可以避免引起争议。较之名学，“名”思想有着更丰富的内涵，在时间跨度上有更强的延伸性。

“名”思想与逻辑两个范畴重合的部分非常少。逻辑是西方学术体系下的一个概念，能否用来界定先秦思想，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部分学者认为，先秦没有逻辑学。代表人物暨南大学程仲棠教授认为：“中国古代没有逻辑学，而只有逻辑理论的萌芽，后来也没有得到发展。逻辑萌芽见于先秦诸子的名辩学。但名辩学有别于逻辑学，二者并非同构，很多地方难以互译。”^②用西方学术体系下的概念来解释几千年前中国

① 崔清田：《名学与辩学》，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8页。

② 程仲棠：《逻辑要与中国现代文化接轨》，载《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4期。对于先秦是否有逻辑思想，程仲棠和马佩展开论战，详见程仲棠：《中国古代有逻辑思想，但没有逻辑学——答马佩教授》，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马佩：《再驳中国古代（先秦）无逻辑学论——对程仲棠教授“答马佩教授”的回复》，载《中州学刊》2010年第1期。



的“名”思想，属于刘笑敢先生所说的反向格义，反向格义很多时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使用时要受诸多条件的限制。在这个问题上，正如曹峰先生所言：“战国秦汉时期关于‘名’的讨论极为活跃，是当时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现象。当时的‘名’可以分为两大类，即伦理学政治学意义上的‘名’与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名’。前者在中国古代影响之大远远超过后者，但二十世纪后在西方学术背景下形成的先秦名学研究，却只重视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名’，未对伦理学政治学意义上的‘名’展开过系统研究，有时甚至曲解伦理学政治学意义上的‘名’，将其当语言学逻辑学材料来使用，这使名学研究偏离了思想史的实态。”^①

2. “名”思想与名家

名家是先秦思想派别之一。

《史记·太史公自序》：“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②

《汉书·艺文志》：“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及警者为之，则苟钩瓠析乱而已。”^③

名家的代表人物有邓析、惠施、公孙龙等。从司马迁和班固的评价来看，名家将“名”作为自己讨论的中心，讲求“控名责实”，极端者达到了“苟钩瓠析乱”的程度。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说：“古代本没有什么‘名家’，无

① 参见曹峰：《两种名家》，《海峡两岸“哲学及其时代角色之自觉”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山东大学，2007年8月。

②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89页。

③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37页。

论哪一家的哲学，都有一种为学的方法。这个方法，便是这一家的名学（逻辑）。所以老子要无名，孔子要正名，墨子说‘言有三表’，杨子说‘实无名，名无实’，公孙龙有《名实论》，荀子有《正名篇》，庄子有《齐物论》，尹文子有《刑名》之论。这都是各家的‘名学’。因为家家皆有名学，所以没有什么名家。不过墨家的后进如公孙龙之流，在这一方面研究的比别家稍为高深一些罢了。”^①

胡适否定名家这一学派，是因为“无论哪一家的哲学，都有一种为学的方法。这个方法，便是这一家的名学”，是忽视了名家对“名”在语言和逻辑上的突出贡献，抹杀了名家思想的独特性，但是他认为诸多学派都有自己的“名学”，无疑是有见地的。诸子几乎都参与了对“名”的讨论，如孔子、荀子的“正名”，庄子的“无名”，墨家后学的“类名”“私名”等，正如郑开所言：“事实上，‘名’与‘辩’乃是诸子哲学的重要部分，儒、墨、道、法、名都各有其‘名学’，还有，以前被误认为是道家先驱的杨朱也有自己的‘名学’。先秦诸子关于‘名学’表现为‘正名’‘名辩’‘形名’和‘刑名’各种理论形态……所以说，诸子之间基于‘名’的话语而进行的诤辩和理论创造才是这一时期的‘时代精神’。”^②

可见“名”思想的范围很广，并非单指名家思想。名家有“名”思想，儒、墨、道、法各家也有“名”思想，而且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先秦名家的学术思想只是“名”思想的一部分，逻辑与“名”思想的差距更大，两者都不足以体现“名”思想丰富的内涵。先秦“名”思想的核心内容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名”的宇宙生成功能、作为事

^①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66—167页。

^② 郑开：《德礼之间：前诸子时期的思想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16—417页。

物运行法则的作用；第二，“名”在社会政治中的应用；第三，“名”的语言哲学内涵。三点之中，只有第三点与偏重逻辑的传统名学研究有重合。

自汉至清初，将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对先秦“名”思想，寥寥的研究仅限于为《墨辩》与《公孙龙子》等著作作注。西晋鲁胜曾注《墨辩》，现仅存其序文一篇。唐代陈嗣古与贾大隐都为《公孙龙子》作过注，现皆亡佚不传。现存的仅有宋代谢希深和明代傅山的《公孙龙子》注。清代中叶以后，在外来文化的刺激下，诸子学兴起，在对诸子研究中兼及名辩，典型的有孙诒让的《墨子间诂》、俞樾的《诸子平议》。这一漫长时期的研究，其侧重点在校勘、训诂，尚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研究产生于20世纪初。代表著作有：梁启超的《墨子学案》、胡适的《先秦名学史》、章士钊的《逻辑指要》、谭戒甫的《墨辩发微》、伍非百的《中国古名家言》、虞愚的《中国名学》等。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引入了西方逻辑学的方法和思路。梁启超用西方逻辑学诠释《墨经》。在《墨子之论理学》中说道：“《墨子》全书，殆无一处不用论理学之法，至专言其法则之所以成立者，则惟《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非命》诸篇为特详。今引而释之，与泰西治此学者相印证焉。”^①他用“论理学”译“Logic”，认为“辩”即“论理学”，“名”即“名词”。胡适的《先秦名学史》是中国逻辑史的第一部断代作品。胡适同样有意识地使用西方逻辑学来研究先秦“名”思想。在本书“导论”中，胡适强调：“近代中国哲学与科学的发展曾极大地受害于没有适当的逻辑方法。”“因此，新中国的责任是借鉴和借助于现代西方哲学去研究这些久已被忽略了的本国的学派。”^②《先秦

① 梁启超：《子墨子学说》，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56页。

② 胡适：《先秦名学史》，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7—9页。

名学史》重点探讨了孔子的逻辑、墨翟及其学派的逻辑、进化和逻辑。从中可以看出，在胡适看来，先秦“名”思想主要是逻辑学。伍非百的《中国古名家言》是这一时期绕不开的巨著。伍非百汇集先秦几乎全部“名”思想资料，对其进行了解说，为后人研究先秦“名”思想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更令人称道的是，伍非百跳出了胡适等人逻辑学的圈子，将先秦“名”思想分别概括为“名理”“名辩”和“名法”三派，他认为：“什么是‘名家’？就是专门研究与这个‘名’有关的学术问题，如名法、名理、名言、名辩、名分、名守、形名、正名等等学问的皆是。而在当时最流行、最显著的是‘名法’‘名理’‘名辩’三派。‘名法’是研究‘形名’‘法术’之学的，这一派应用在政治上就是申不害一流的‘术家’，应用到法律上就是商鞅一流的‘法家’。他们都注重‘循名责实’‘综核名实’的法术。后世称为‘刑名’的，实即‘形名学’之末流，不过‘刑名’二字内涵比‘形名’更窄了。另一派叫‘名理’，是研究所谓‘极微要眇’之理论的，如辩论‘天地之终始，风雨雷霆之故’‘万物之所生恶起’及‘时、所’‘宇宙’‘有穷、无穷’‘至大、至小’‘坚白’‘无厚’‘影不动’‘指不至’‘火不热’等问题。这一派是中国最早的自然科学理论家，在春秋末年至战国初、中期，曾流行一时。不过当时都当作‘戏论’，因为无法实验，有些人认为有趣，有些人斥为无益，到秦汉统一时就亡绝了。晋人清谈乃其余风，故晋人有时称善清谈者为善谈‘名理’。又一派是‘名辩’，乃研究‘名’‘辞’‘说’‘辩’四者之原理和应用的，详言之，就是研究‘正名’‘析辞’‘立说’‘明辩’的规律和有关问题。有时亦涉及思维和存在的问题。这派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班固《艺文志》所列的‘名家’，大约以属于此派者居多。”^①

^① 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6页。

值得注意的是，沈有鼎先生于1980年为此书作序，称赞“伍非百先生的《中国古名家言》一书，是对中国逻辑史的巨大贡献”^①，显然还停留在把名学等同于逻辑学的思路。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对先秦“名”思想的研究依然沿袭胡适等人的思路，将其等同于逻辑学。这一时期的新特点是对公孙龙等名家进行了重新评价，观点和结论较前更为公允。代表作有：孙中原的《中国逻辑史》、周昌忠的《公孙龙子新论》、周云之的《公孙龙子正名学说研究——校诂、今译、剖析、总论》。周山《智慧的欢歌：先秦名辨思潮》《绝学复苏》等书则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名家学派进行了总结和梳理，认为20世纪名家研究的成就主要有三点。“首先，确定了名家的对象范围，理清了名家前后相继的脉络，以及与其他名辩学派的联系和区别。其次，对名家著作进行了仔细的清理。最后，弄清楚了名家的主要学问就是逻辑学。在研究方法上的成就有两点：一是进行了中西思想文化的比较研究，二是利用近现代自然科学知识，运用辩证思维方法，对名家提出的诸多问题进行分析研究。”^②

比较民国和新中国成立之后至20世纪80年代两个时期的研究，共同的缺点是以西方的逻辑比附内涵更加丰富的先秦“名”思想，使之简单化。崔清田明确指出这种方法的缺陷在于：“模糊了对目的、对象、性质及内容不同的墨家辩学与西方逻辑的认识，使两者的比较失去了前提。使名学与辩学的研究，实际成了西方逻辑学的中国讲述，而不是具有自身特质的中国名学和辩学的阐释。”^③这样做的后果是使研究的视野受到局限，影响了研究的深入开展。

① 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

② 周山：《绝学复苏》，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9—10页。

③ 崔清田：《名学与辩学》，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8页。

在这种思路的影响下，崔清田在《名学与辩学》一书中跳出逻辑学的圈子，注重从政治和伦理倾向分析名学。但沿着这一方向的研究力量却非常薄弱，已经出版的著作，只有翟锦程的《先秦名学研究》、我国台湾地区林翠芬的《先秦儒家名实思想研究》等寥寥几部。《先秦名学研究》拓展了研究范围，认为：“名学所涉及的问题不仅仅是名实关系问题本身，而且还关涉到社会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包含着更丰富的思想内涵，具有更深刻的理论价值和更广泛的文化意义。”^①因此，在讨论先秦诸子“名”思想时，《先秦名学研究》有意识地联系具体的社会背景，结合文化分析，从多方面进行了探索。

20世纪初以来，“名”思想的研究相对较少，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名家与墨辩，在研究中侧重逻辑思想。近十年来，一些学者冲破了逻辑的藩篱，尝试从语言学、符号学等方面对名家与墨辩进行深入的分析。如刘利民的《在语言中盘旋：先秦名家“诡辩”命题的纯语言思辨理性研究》认为：先秦“名实之辩”对语言的高度关注，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语言本身的理性反思，这就是名家之所以出现的历史原因。刘文以语言哲学的框架，对名家的“诡辩”命题进行了新的解释。从“使用”与“提及”区分的角度入手，审查、解释名家命题。刘利民认为，“使用”与“提及”所区分的是语言的实质性（即“使用”）和形式性使用（即“提及”）两种截然不同的语句分析框架。实质性语言框架所表现的语言性认知操作是与实践有直接或间接关联的，其意义具有刚性或弹性的可验证性；而形式性语言框架所表现的则属于纯语言性的认知操作，是在语言中的逻辑盘旋，与现实事物或事件没有必然联系，其意义不具有可验证性，只能以纯逻辑的方式进行分析 and 审查。在一个命题中被“提及”的语句因此超越了其具体的物指作用，不限于具体的事物，而成了

^① 翟锦程：《先秦名学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思想的对象。对被提及的语句的分析也就是不涉及具体物指的纯语言性分析了。现代语言哲学家对“使用”与“提及”进行区分，展现了他们的哲学智慧。同时也说明，这种区分不仅是技术性区分，而且确实含有实质性的语言哲学价值。这个价值对于古今哲学家来说应当是相同的。先秦名家也可能利用这个区分进行哲学思辨。在先秦名辩思潮中，名家很可能已经注意到了语言意义本身的问题。名家那些被视为诡辩的语句也极有可能是名家对其中语词的“提及”使用，反映了他们关于语言本身的哲学自觉。^①

朱前鸿的《先秦名家四子研究》用符号学的方法，解析公孙龙、惠施、邓析、尹文子等先秦名家四子的思维方法和逻辑思想，对“白马非马”“合同异、离坚白”等著名论题提出了独特的解读思路，认为：“名家四子名实思想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其专门的符号学思想探索方面，他们从纯逻辑的角度，探讨了语义学和语用学领域的问题，尤其到了公孙龙，已经形成了较完善的符号学指称理论体系，这在中国古代可以说是独树一帜。”^②

我国台湾地区丁亮的《无名与正名：论中国上中古名实问题的文化作用与发展》，从共时的角度考察了名实问题在社会文化中的作用，认为名实问题是中国文德传统的核心，其核心议题是价值表述而非逻辑推理；从历时的角度考察了名实问题在历史发展中的推动作用，认为因为周人文德衰败而有了名实问题，先秦诸子纷纷提出理论对策，其中正名观因为集中权力的特质而首先在秦汉时登上了政治舞台，无名观因为重视人心的天真简静而于魏晋登场，无名观与正名观相互融

① 刘利民：《在语言中盘旋：先秦名家“诡辩”命题的纯语言思辨理性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② 朱前鸿：《先秦名家四子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9页。